

黄时鉴文集 II



# 迤逦心契

中外文化交流史  
(迤于蒙元时代)

中西書局

# 黄时鉴文集

## II

### 远迹心契

——中外文化交流史  
(迄于蒙元时代)

# 目 录

- 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 / 1  
“條贯主”考 / 11  
辽与“大食” / 16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识读余论（附影印原件） / 31  
佛国寺双塔与中国古塔的比较研究 / 59  
相远以迹 相契以心  
——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 / 73  
宋丽蒙关系史事一瞥  
——《收刺丽国送还人》考述 / 87  
元高昌僂氏人东遗事 / 98  
元代的对外政策与中外文化交流 / 118  
释《北使记》所载的“回纥国”及其种类 / 135  
波斯语在元代中国 / 143  
现代汉语中的伊朗语借词初探  
——兼从一个侧面看中国文化心理 / 154  
元代四体铭文铜权的考释  
——以识读波斯文铭文为主 / 166  
元代扎你别献物考 / 175  
阿刺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 / 182  
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 / 199  
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 / 214  
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 / 218  
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  
——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 / 226  
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  
——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 234

元代缠足新考与马可·波罗未记缠足问题 / 254

中国早期介绍马可·波罗事迹的文献 / 273

《光明之城》伪书考 / 281

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 / 306

我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 326

**【附】译文两篇**

《伊利汗积尺》的长序（波伊勒撰） / 340

亚历山大传说在中亚（波伊勒撰） / 348

## 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

对于游牧民来说，欧亚草原是它们东西驰骋的天然通道。可是这条通道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才走通的，古代的文献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关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载录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文献中关于西北方氏族或部落的记载可以上溯至夏代的荤粥、商代的鬼方、西周的玁狁和春秋战国之际的戎、狄，可是在那些简略的记载中，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走通了欧亚草原之路。《穆天子传》提到一些部落：犬戎胡郿人、河宗氏、鬲口之人、珠泽之人、赤乌之人、曹奴之人、容成氏、劓闾氏、酈韩氏、西王母之邦、智氏、鬲胡氏、鬲余之人、浊繇氏、骨钐氏、重鞬氏、文山之人、巨蒐氏。如果对这些部落可以基本考定他们的居地，我们就会对西周时的草原之路有所了解，但迄今尚未有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说，在匈奴兴起以前，中国文献中北方氏族或部落向西方活动的实际情况，我们是无从详考的，尽管有些学者作了不少研究。

有幸的是，在匈奴兴起以前，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前484—前425）记述了欧亚草原上的居民。尽管对于他的记述学术界存在各种歧见，但这份宝贵载录毕竟是我们可资凭借的研究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得知公元前7世纪后期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欧亚草原上的主人是谁，而且正是他们承担了开辟欧亚草原之路的重要的历史角色。

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中的记述，欧亚草原上的居民是：斯基泰人（Scythae）居住在黑海以北，西临伊斯特河（多瑙河），东迄塔纳伊司河（顿河）；塔纳伊司河以东是撒罗马泰人（Sauromathae），在撒罗马泰人上方是布迪诺伊人（Budinoi）；布迪诺伊人以北有一片荒漠，这片荒漠折东是

图萨格泰人（Tyssagetae），邻近有玉尔凯人（Iurcae）；<sup>[1]</sup>图萨格泰人以东是背叛了王族的斯基泰人别部；再向东是粗糙的多岩石地带，居住着阿尔吉帕人（Argippaei）；阿尔吉帕人东边有高不可越的山脉，他们以东住有伊塞顿人（Issedonians）；据伊塞顿人说，以北有阿里玛斯庇亚人（Arimaspea）和看守黄金的格律芬斯（Griffins），而在这些人的那边则有希佩尔波利亚人（Hyperboreans），其领土直抵大海。<sup>[2]</sup>

关于这些居民所在的地域，最西面的斯基泰人是明确的，即在今多瑙河与顿河之间。斯基泰人以东的撒罗马泰人，据欧美学者的研究，其活动地域东抵乌拉尔河和乌拉尔山。<sup>[3]</sup>乌拉尔河以东的情况便不很明确。但希罗多德说到，阿尔吉帕人东边有“高不可越的山脉”，现在学者们倾向于断定此山为阿尔泰山，这样，这座高山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坐标。<sup>[4]</sup>由此可见，阿尔吉帕人当居住在阿尔泰山的西南、额尔齐斯河上游与宰桑湖周围，即准噶尔盆地的北部；而布迪诺伊人、图萨格泰人、玉尔凯人和斯基泰别部则自西向东分布在乌拉尔和巴尔喀什湖之间。<sup>[5]</sup>在阿尔吉帕人以东，既然阿尔泰山“高不可越”，那么伊塞顿人就当居住在准噶尔盆地以东、沿天山山脉东部北麓一带。至于阿里玛斯庇亚人和希佩尔波利亚人的居住地域和族属，需要放在后面再作出推断。

对于上述各种居民，希罗多德分别记下了一些具体的经济生活状况和民情风习。在各种居民中，图萨格泰人和玉尔凯人是偏北的森林狩猎民，他们的

---

[1] 此 Iurcae 不能译作奄蔡（Aorsi, Alanorsi 阿兰）。

[2] 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

[3] A.I. Melyukova, "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ited by D. Sinor), Cambridge, 1990.

[4] 在较早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如韦斯特伯格（Westburg, *Klio*, iv, 183 seq.）豪与韦尔斯（How and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es*, Note on iv, 21—5）等曾考证此“高不可越的山脉”是乌拉尔山，可是乌拉尔山的最高点仅海拔1400米，作为山脉，它并不算高，而且有一些易于通过的山道。比较而言，阿尔泰山堪称“高不可越”，它的最高点为海拔4374米，它虽有隘口可以通过，但是地势险要，“越”非易事。后来学者们大多判断此“高不可越的山脉”是阿尔泰山，在这点上较早作出明确论述的当是赫德森（C.F.Hudson），见其《欧洲与中国》（*Europe and China*），第35—36页，1931年初版。而在撒罗马泰人的活动地域被确定为东迄乌拉尔河以后，这个判断就显得更为可信。

[5] 布迪诺伊人、图萨格泰人、玉尔凯人和斯基泰别部的居地都难以具体确定。赫德森逐个给以推断，但他将图萨格泰人置于乌拉尔河流域显然是失于偏西了。参见其前揭书第36页及所绘地图。孙培良在其《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1985年）一文中推测希罗多德提到的图萨格泰人境内的四条大河是萨马拉河、乌拉尔河、托波尔河和米阿斯河，其总体方位也失于偏西。

族别尚难研究清楚。希罗多德记述，撒罗马泰人是斯基泰人与阿马松人（欧约尔帕塔人）相结合的后裔，仍讲斯基泰语。布迪诺伊人是青眼红发的土著游牧民，也讲斯基泰语。所以当时欧亚草原上的主要居民可以称为广义斯基泰人，包括斯基泰人（狭义的）、撒罗马泰人、布迪诺伊人和斯基泰别部。<sup>[1]</sup>“斯基泰”是希腊人对他们的称谓。现在，学者们倾向于认定，在古代欧亚草原以及中亚一带从事游牧的广义斯基泰人，实际上就是波斯人所称的塞迦人（Saka），汉文载籍中的塞人（Sek）。<sup>[2]</sup>他们留有长发，在体质形态和面貌方面明显地属于欧罗巴人种。不过，由于斯基泰人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和语言学资料都显出多因素的特点，在斯基泰族源问题上有伊朗说、伊朗—乌拉尔·阿尔泰说、乌拉尔·阿尔泰—伊朗说，甚至还有乌拉尔·阿尔泰说。

如果广义斯基泰人的论断不难确立的话，那么阿尔吉帕人和伊塞顿人的族别就颇为复杂。先说阿尔吉帕人。希罗多德记述阿尔吉帕人与斯基泰人衣着相同；但他直截了当地称他们为“秃头人”。所谓“秃头人”，绝不可能是说阿尔吉帕人生来均无头发。这个“秃头人”称呼使我们联想到阿尔泰语系民族剃顶的发型，而且希罗多德又提到这种“秃头人”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这又分明是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显然是不同于斯基泰人的。德国的托马舍克（W.Thomaschek）和日本的白鸟库吉都认为阿尔吉帕人是突厥人。托马舍克说阿尔吉帕就是突厥语词 Yargičibai，义为君主兼法官，或即“断事官”之类。

希罗多德说阿尔吉帕人有自己的语言，可是实际上他所记下的两个词语“彭提孔”和“阿斯库”却成了难题。据研究，用作一种树名的“彭提孔”可能是伊朗语词，而拿这种树的果实榨出的液汁“阿斯库”则可能是突厥语词。<sup>[3]</sup>因而语言学方面的探讨对问题的解决起不了什么作用。

[1] 据前揭梅柳考娃（Melyukova）文，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6—前4世纪时撒罗马泰人有两个地方群体，一在下伏尔加（伏尔加河流域与顿河之间），一在萨马拉—乌拉尔。前者当系希罗多德所称的撒罗马泰人，后者难以从古代文献中找到比对名称。然而两者位置近密，可见他们的成员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据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分析，今学者们认为撒罗马泰人以及斯基泰人的祖先，乃是青铜时代斯鲁勃纳亚（Srubnaya）文化的居民。参见 К.Ф. Спирнов, *Сауроматы*, Москва, 1974.

[2] 参见 T. Sulimirski, “The Scyth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2, pp.149—199, 1985;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余著塞种部分首次在中国集中译介了古波斯、希腊和罗马关于塞种的载录，并给出了自己的考释。

[3] E.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pp.108—109, 1993. 此段文字，参见前揭孙培良文，注7。

苏联学者根据大量考古资料作出了如下的论断：在公元前 1700—前 1200 年间的安德罗诺沃时期，东起叶尼塞河中游和阿尔泰山地区、西迄乌拉尔河流域的居民主要是以安德罗诺沃文化为代表的欧罗巴种的人，而在其北部的西伯利亚森林中则生活着蒙古种短头型人；在公元前 1200—前 700 年间的卡拉苏克时期，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发展起来，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看到中国北部商代文明的重大影响，这里发现的蒙古种人可能正是传播商文化的中国北部移民；在公元前 700—前 200 年间的塔加尔时期，在中国商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卡拉苏克文化演进为塔加尔文化。而正是在塔加尔时期，西伯利亚森林中的蒙古种短头型人大量南移，到达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山地区。<sup>[1]</sup>把希罗多德的记述和这些考古学上的论断联系起来看，大体上可以判断，在公元前 7 世纪以后，居住在阿尔泰山西南一侧的阿尔吉帕人——“秃头人”，可能就是来自北方西伯利亚森林的蒙古种人。<sup>[2]</sup>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阿尔吉帕人是蒙古人种，可能是前突厥人的一部分。当他们进入准噶尔盆地后，可能把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广义的斯基泰人挤走了，但同时又含纳了斯基泰文化因素，如衣着、词汇等。根据考古资料，现有学者认为在阿尔泰山的西部的居民，“先是在游牧的撒罗马泰人——与斯基泰人同时，并且有联系——的统治之下，最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sup>[3]</sup>进击这些撒罗马泰人的，可能就是阿尔吉帕人，而且阿尔吉帕可能正是在与撒罗马泰的人接触中吸收了斯基泰文化因素。著名的阿尔泰山区的帕兹里克墓地第二号墓的遗体为此点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男性族长（约六十岁）的遗体是蒙古

---

[1]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1951 年第 2 版），上册，莫润先等译，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蒙盖特（А.Л. Монгайт）：《苏联考古学》（1955），第 3、4 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本，1963 年。波塔波夫在《南阿尔泰山族源概述》一文中论述：“蒙古种人之开始进入阿尔泰山区，是在公元前的一千年代中叶，……大概在公元 6 世纪才告以完成。”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 年。

[2] 在阿尔泰山西麓新疆青河县花海子，也发现了一大批大型石冢。马雍、王炳华说：“这批古墓未经发掘，对其文化内涵尚不清楚。据苏联境内图瓦共和国、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希额依德尔苏木等地所发现的与此有共同特征的文化判断，这些墓葬可能属公元前 7—5 世纪时代游牧民族的遗址。”见两位论文《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 3 辑，1990 年。两位没有对此游牧民族给出进一步的说明，而且他们认为阿尔吉帕人“分布在哈萨克丘陵地带”。我觉得两位在推断阿尔吉帕人居地时忽略了“不可越过的高山”这个重要标记。相比而言，阿尔泰山地区大型石冢更可说明蒙古种短头型人南下到达这里，而在阿尔泰山西侧的正好是阿尔吉帕人。

[3] E. D. Phillips, *The Royal Hordes*, p.48, London, 1965.



型，而其妻（约四十岁）的遗体则是欧洲型。<sup>[1]</sup>

如果按照以上的判断，那么阿尔吉帕人在中国文献中是否留有什么信息？我们以为阿尔吉帕很可能就是中国文献中的呼揭。《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有匈奴冒顿单于在汉文帝四年（前176）致汉文帝书的一段文字：“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而《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则提到，“是时，西方呼揭王来”；又提到郅支单于在投奔康居以前，“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零，并三国”。呼揭与乌揭是同名异写，可无异议。呼揭/乌揭所在的方位，在匈奴以西，乌孙以北，其西（西北）又有坚昆，它的位置就当在阿尔泰山西南的准噶尔盆地一带。《三国志》卷三〇所录《魏略·西戎传》仍记：“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余人，随畜牧，出好马，有貂。”呼得亦即呼揭，其居地至曹魏时尚大体未变，或稍向西扩展势力。<sup>[2]</sup>至于呼揭的地域，哈仑、松田寿男和蒲立本（E.G. Pulleyblank）等均曾涉及，认为呼揭在阿尔泰山地区。<sup>[3]</sup>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标明呼揭在准噶尔盆地一带。而且从对音关系看呼/乌揭（‘Xuol/‘uo-kiot），又可以与阿尔吉帕（Argippaei）一词的前两个音节 Argî 勘同。只是由于呼揭/乌揭的汉文载录晚于阿尔吉帕，所以我们可以将阿尔吉帕人认作前呼揭人。

下面再说伊塞顿人。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阿尔吉帕人以东是伊塞顿人。既然阿尔泰山“高不可越”，那么伊塞顿就只能是居住在准噶尔盆地以东、阿尔泰山脉东南端的南麓和天山东部的北麓。<sup>[4]</sup>

[1] E. D. Phillips, *The Royal Hordes*, p.82.

[2] 《魏略·西戎传》此段文字，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卷三三九《四裔考》中曾予引述。苏联学者伯恩斯坦（А. Н. Бернштам）据以考证呼得即今居于额尔济斯河和鄂毕河之间的奥斯加克人，见其《北亚民族起源短论》，罗致平译，载前揭《民族史译文集》。

[3] G. Haloun, “Zur ü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91, pp.243—318 (296), 193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70年增订本），陈俊谋译，第31—36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4] 在早期的研究中，伊塞顿人被推定在乌拉尔山的东麓或其以东某处；后来，托马舍克（W. Thomaschek）、闵斯、赫德森等主张伊塞顿人的居地在塔里木盆地，参见前揭孙培良文。今马雍与王炳华“认为伊塞顿人只可能分布在楚河至伊犁河之间”（见两位前揭文）。但是我以为，将伊塞顿人置于本文所述的方位，似更正确，考见下文。

希罗多德笔下的伊塞顿人有如下风俗：父死杀羊献神，而后食混在一起的死者的肉和羊肉；把死者的头皮剥光，擦净之后镀金作为圣物；妇女与男子平权。白鸟清把伊塞顿人对人头的处理与藏族用头盖骨制杯的风俗相比，认为从风俗上考察，伊塞顿人为藏族。提出伊塞顿人是羌人的观点也是根据的这一点，而古代藏族源自羌人是比较普遍的说法。可是这种民族学的结论已经被民族学方面的新成果所动摇。据研究，剥头皮和用头盖骨制杯乃是两种风俗，前者源自欧亚大陆北部的古老文化，而后者则源自藏系民族。它们的传播，剥头皮风俗自北向南，用头盖骨制杯风俗自南向北，于是中亚有一些居民兼有这两种风俗，而这些居民又分别属于伊朗语系和阿尔泰语系。<sup>[1]</sup>伊塞顿人就兼有这两种风俗，因而说他们属于藏人或羌人是很难成立的。

比较多的学者把伊塞顿直接考定为乌孙，主要的理由是：一、伊塞顿（Issedonians）的前两个音节 *Isse* 可以与乌孙 *Uusun* 勘同；二、伊塞顿人的住地与后来乌孙活动的地域相同，而且当乌孙后来活跃在伊犁河流域及天山一带时，在古希腊文献中继续有大致同一地域的关于伊塞顿人的记载。<sup>[2]</sup>理由一是不够牢靠的，第二个音节 *se* 与 *sun* 的勘同不够贴切。理由二也似有破绽，因为按照通论，乌孙原居地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只是在公元前 2 世纪时，由于匈奴的侵压才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但是，乌孙原居地在河西走廊西部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很成问题的。

关于乌孙原居地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和松田寿男提出过非常值得注意的论说。据加藤繁的研究，《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这句话，乃是班固错误引述《史记·大宛列传》的结果，其余一切关于乌孙在祁连、敦煌间即在河西走廊的说法也都是没有根据的。松田寿男在坚持加藤繁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乌孙与匈奴、月氏之间的关系的史

[1] 江上波夫：《欧亚大陆的剥头皮习俗——兼谈斯基泰人的起源问题》，蔡葵译自《亚洲文化史研究》（日本山川出版社，1967年），载《民族考古译文集》（云南），1985年第1期。

[2] 最重要的记载见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志》，见戈岱司（George Coedès）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第30—34、48页，中华书局，1987年。关于托勒密所记“斯基泰伊塞顿”与“赛里斯伊塞顿”的考证，可参见前揭赫德森书，第39—42页。赫德森是较早明确主张伊塞顿即乌孙的学者之一。萨莫林就此说作过论证，见 W. Samolin,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Palaeologia*, IV, Tokyo, 1956。法国学者韩百诗在其主编的《中亚历史与文明》（L. Hambis, *L'Asie Centrale*, Paris, 1977）一书中也力主此说，见耿昇的有关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

料，认定乌孙的原居地只能是在匈奴以西；而依据《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和《太平御览》卷一六五《州郡部》的有关记载，他又考证乌孙的原居地是在天山东端博格达山的北麓。<sup>[1]</sup> 我以为，松田寿男的考证是可以成立的，而且由于在天山一带发现早至公元前5世纪的乌孙墓葬，他的结论就显得更为有力。<sup>[2]</sup> 所以，从活动的空间看，伊塞顿人与乌孙人在居地方面是契合的。只是从时间上看，伊塞顿人早于乌孙人，所以不宜在伊塞顿人与乌孙人之间直接划上等号，而可以把伊塞顿人认作前乌孙人。这么看来，第二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而有了这块基石，伊塞顿与乌孙的对音勘同也就有一定的可信程度，尽管不够贴切。<sup>[3]</sup>

那么伊塞顿—前乌孙人是属于广义的斯基泰人还是属于阿尔泰人呢？前面已经提到，伊塞顿人有剥头皮和用头盖骨制杯的风俗，但单凭这个资料，从民族学的角度难以判明它的族属。孙培良曾译引12世纪拜占廷诗人泽泽斯的《千引卷汇编》(Tzetzes, *Chiliades*)中所保存的公元前7世纪后期阿里斯梯亚(Aristeas)所著长诗《独目篇》的六行原文，提到“以长发自豪的伊塞顿人”，据此，从发型看，伊塞顿人当属于广义斯基泰人一塞人，但这句话的出处尚待查核。<sup>[4]</sup> 而从天山中部的古墓发掘资料看，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认为公元前5至前3世纪这一带古墓主人都是属于塞人的，他提出当时在这一带居住的是塞—伊塞顿人。<sup>[5]</sup> 后来，西部天山以北、七河地区，照《汉书·西域传

[1]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1—36页。

[2] 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根据多年考古发掘，提出如下的假设：天山是塞和乌孙的摇篮，天山地区的塞人主要是伊塞顿人即乌孙的前身。参见本页注5。

[3] 马雍、王炳华定阿尔吉帕人“分布在哈萨克丘陵地带”，因为他们认为，居于阿尔吉帕人以东、且与居于阿克塞斯河(Araxes)北岸的马萨吉太人相毗邻的伊塞顿人“只可能分布在楚河至伊犁河之间”。余太山同意此说，见其论文《大夏与大月氏综考》，载《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但是，同样从希罗多德的地形描述看，阿尔吉帕人东面的高山当定为何山？更从种族迁移看，秃头人那时已进至哈萨克丘陵地带之推断似尚缺乏证据。所以，是否可以将马萨吉太人活动的地域设想得范围大一些，即他们（或与他们邻近的部落）曾达到伊犁河流域，这样也可以与活动在天山北麓的伊塞顿人相毗邻。由此再可想到，马萨吉太人是否与中国文献中所称的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有一定联系。余太山引述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认为Assi是Isse[dones]的异写，但据此仍置伊塞顿在楚河、伊犁河流域。问题是，既然在斯基泰人以东有Massagetae、Sacaе和Assii等部人，若Massagetae在锡尔河以北，则置Sacaе于楚河、伊犁河流域，置Assii(Issedones)于天山北麓，似乎就更加合理。

[4] 参见前揭孙培良文，但译文未注明所据。前揭赫德森书第42页上也有相关文字，却未有“以长发自豪的”诸字。

[5] A. H. Бернштам.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семиречья и тянь-шаня”,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x1, стр. 337—384, 1949.

下·乌孙国》的说法，“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而颜师古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sup>[1]</sup>其实，乌孙本身就是塞人的一种。古希腊文献中的斯基泰人，就族属关系而言，正是古波斯碑铭中的塞迦，即中国文献中的塞人，这一点已日渐被学术界承认。他们有相同的体质形态，他们讲的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支，因而可以把伊塞顿—前乌孙人纳入广义斯基泰人一塞人的行列。但是，有迹象（如剥头皮和用头盖骨制杯的风俗）表明，伊塞顿—前乌孙文化显然已受到北方的阿尔泰人和南方的羌人的影响。

伊塞顿人以北有阿里玛斯庇亚人。既然伊塞顿人在东部天山山脉北麓，那么在他们以北的阿里玛斯庇亚人就应当居住在蒙古高原偏西的地方。在匈奴以前，中国文献中提到的北方民族有荤粥、鬼方、獯豸等。托马舍克、闵斯（E. H. Minnis）、白鸟库吉和赫德森都大致判断阿里玛斯庇亚人是中国古史上的獯豸或匈奴，但未加论证。希罗多德提到阿里玛斯庇亚（Arimaspea）是斯基泰语词，义为“独眼”。尽管托马舍克曾认为希罗多德对 Arimaspea 的解释是“民间字源学”，不足凭信，但实际上并不能有力地予以否定。<sup>[2]</sup>而关于“独眼”，倒可以从北方民族的传说中得到印证。《山海经》第八《海外北经》、第十二《海内北经》都提到“一目国”和“为物人面而一目”的“鬼国”。《淮南子》卷四《坠形训》：“八纒之外，而有八纒，亦方千里。……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高诱注云：“国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盖流沙所出也。”<sup>[3]</sup>有关北方民族独眼的传说，一直延续到蒙古族的祖先，据《蒙古秘史》第四节，成吉思汗的祖先都蛙锁豁儿额上生一独眼，能望见三程远的地方。生活在草原上的北方游牧民族眼力很好，这或许正是形成他们具有独眼的传说的原委。总之，从独眼之说可以推定阿里玛斯庇亚人当即汉文文献中所载录的鬼方之类北方民族。但现在我们不能确切

---

[1] 乌孙的族属，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原来颇有一些学者，分别主张鞑靼说、突厥说、西突厥说、吉利吉思说、哈萨克说以及芬说等等，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又有一些学者分别主张印度日耳曼说、吐火罗说、斯基泰说等等，属于印欧语系民族。

[2] 白鸟库吉：《东西交通史上的游牧民族》（1942），傅正汉译文。

[3] 《诸子集成》，第7册，第58页，中华书局，1986年印本。

地将他们比定为鬼方，或犂粥，或獯鬻等等，只宜将阿里玛斯庇亚人看作前匈奴人，也就是匈奴兴起以前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北方游牧民族。

至于格律芬斯人，在汉文文献几乎找不出可资考证的对比线索，我们就只能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认定他们是与阿里玛斯庇亚人相邻而居了。而鉴于希罗多德称“守护黄金的格律芬斯”，则可以推想他们邻近阿尔泰山地区，或在阿尔泰山的北麓。格律芬（Griffin）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头翼似鹰、躯体似狮的怪兽。在斯基泰艺术中，尤其是在金器上，常见格律芬的形象，后来它也出现在萨尔马梯人（Sarmatians）和匈奴人的艺术造型中。<sup>[1]</sup>

最后是希佩尔波利亚人。从希罗多德的记载看，他们是在阿里玛斯庇亚人那边、其领土直抵大海的极北居民，可以推测为东西伯利亚的居民。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希佩尔波利亚人即指汉人，因为他们认为希罗多德记述草原居民的方位有误，所记“北方”往往当指“东方”。这种看法迄今尚有影响。<sup>[2]</sup>可是，这样的判断太多臆测的成分，实在没有什么根据。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北”与“东”都经常出现，如果没有充分的论证，恐怕不能轻易地把所说的北方改为东方。然而在希罗多德具体记述极北居民时，显得相当杂乱，令人难以确考。极北居民与我们论述的主题较少直接关系，姑且暂时把他们搁置起来。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阿尔吉帕人即前呼揭人，居于阿尔泰山西南麓、额尔济斯河上游和宰桑湖周围，在准噶尔盆地北部；伊塞顿人即前乌孙人，居于天山东部北麓；阿里玛斯庇亚人即前匈奴人，居于蒙古高原。阿尔吉帕人属于阿尔泰人，其文化受到斯基泰人的影响。伊塞顿人是广义斯基泰人，其文化受到阿尔泰人以及古藏人的影响。阿里玛斯庇亚人属于阿尔泰人。诸人的居地分布，正是阿尔泰人南迁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这个南迁运动在此以后仍在进行，并同时发生西迁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运动中，斯基泰人和阿尔泰人发生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正是斯基泰人和阿尔泰人，他们在游牧生涯和迁徙活动中，走通了欧亚草原之路。

---

[1] 参见 *From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 Ancient Treasures*, plate 15, 3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5;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143、147页; 田广金、郭素新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图版117—1、119—1,文物出版社,1986年,但造型显有变异。

[2] 例如夏瑞春在其所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1985)一书的编者后记中含糊地写道:“古希腊人把中国当作了许佩博雷人(Hyperboeaner)……”见陈爱政等汉译本,第2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关于古代这条欧亚草原之路的具体通道，文献资料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载。如果依据上述对希罗多德笔下欧亚草原诸居民住地的分析，那么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是宽广的草原道，中间需要越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道路大致有三条：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湖西缘时，通道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入伊犁河流域，在这里，斯基泰—伊塞顿人沿着天山北麓向东一直延伸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而从博格达山北麓向北，古代游牧民又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这就是后来的巴里坤道）。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也可以偏向东北，进至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斯基泰—塞人也可以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济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上面考证了希罗多德的记述，“高不可越的山脉”是阿尔泰山，但是实际上这个山脉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这个“高不可越”只能被理解为“通常难以逾越”罢了。如果阿尔吉帕人是从阿尔泰山以北地区南迁到准噶尔盆地的，那么他们肯定就越过了阿尔泰山。地理学告诉我们，在绵亘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不只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有三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以后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都曾走过这些通道。第三道，当然，从东钦察草原的东缘东行，渡过额尔济斯河抵达鄂毕河以后，也可以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草原，可是走这条道路必须通过阿尔泰山与唐努乌梁山之间的崎岖山地，相当艰险。相对而言，第一道是最易通行的，这一道实际上正是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北道的一部分。中西之间的通道，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密切关系首先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不过迄至希罗多德时代，这一带都只有游牧民族在活动，他们是欧亚草原的主人，他们也是欧亚草原之路——东西之间最早的通道——的开辟者。

（《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條贯主”考

自从192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支那名称之起源》一文中将7世纪突厥碑铭上的 tabghač、东罗马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喀塔(Théophylacte Simocatta, 7世纪前半叶)《历史》所记的 Taughast 与1221年丘处机西行时听到的“桃花石”联系起来,指出此为中亚及其以西诸民族对中国的另一名称,这个问题长期引起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各家致力于探索突厥语词 tabghač/回鹘语词 tavghač在汉语中的原词,迄至1983年章巽发表《桃花石与回纥国》,归纳起来,共有拓跋、唐家(子)与大汗三说。我是支持拓跋说的,但提不出什么新的见解。而对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仍有可以讨论之处: tabghač/tavghač一词的汉文音写,在进入13世纪以后方见载录于《长春真人西游记》,作“桃花石”,在此以前,是否汉人一无所闻,一无所记?近读宋人笔记,见一政和七年黑汗王表文。今写此短文,考证此表文中的“條贯主”当是 tabghač/tavghač的另一种回译音写。若是,政和七年为1117年,则 tabghač/tavghač被音写作“條贯主”就比“桃花石”早了百余年。

我所读到的黑汗王表文,《宋史》与《宋会要辑稿》均不载,今见于宋人蔡條的《铁围山丛谈》和张世南的《游宦纪闻》。《铁围山丛谈》所记文字如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條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條贯主阿舅黑汗王,

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條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曛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赤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赤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哈。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

这表文又见于《游宦纪闻》卷五：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繁体字原文作條，下同。引者）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有关史事，蔡條还记述：“政和末，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而宋徽宗新作此玺，《宋史》卷一五四《輿服志》载明：“政和七年，从于阗得大玉逾二尺，色如截肪。徽宗又制一宝，……号曰定命宝。……且曰：八宝者，国之神器。至于定命宝，乃我所自制也。”可见黑汗王上表献玉，事在政和七年，当可确定。《宋会要辑稿·蕃夷七》载，“政和七年正月八日，于阗国遣进奉使纥牟米阿点撒罗、副使大僧阿俟忽伦来贡方物”。可能记的正是这一次黑汗王进贡宋徽宗所求的美玉。

细读蔡條与张世南的记载，两者文字略有差异。蔡條是北宋权臣蔡京之子，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1125年蔡京被勒令致仕后，他谪居白州。他写《铁围山丛谈》，迟不过绍兴年间（1131—1162）。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在后，当在绍定改元（1228）以后。但就表文文字看，张世南并未照抄蔡條。而据行文体例与张世南的载录，上表的黑汗王加上称号，宜作“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條（原文作條）贯主师子黑汗王”。“师子黑汗王”，蔡條作“阿舅黑汗王”，“阿舅”两字有误。这个“师子黑汗王”应是喀喇汗朝的第十九代汗阿赫马德（哈龙）·哈桑，他1102/03—1128年在位，号阿尔斯兰汗。<sup>[1]</sup>“阿

[1] 参阅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尔斯拉”即突厥语 arslan 的音译，义为师子。黑汗，即喀喇汗，突厥语 kara（喀喇），义为黑、大。宋人往往将黑汗王视为于阗国王，那是因为在 1007 年喀喇汗朝势力已占有于阗，<sup>[1]</sup> 而后来黑汗王向宋遣使通贡也都经由于阗。至于师子黑汗王称宋徽宗为“阿舅大官家”，则是因为喀喇汗族出自回鹘，唐时屡有公主下嫁回鹘，回鹘可汗称唐帝为阿舅（岳丈），黑汗王沿袭了这种姻亲称谓。

以上对与表文有关的史事以及宋与喀喇汗朝的关系作了说明，下面进而讨论“條（條）贯主”。在表文中，“师子黑汗王”与“阿舅大官家”前都有“條（條）贯主”三字，它们是什么意思？

这三个字的第一个字，《铁围山丛谈》有的版本作“條”（如《知不足斋丛书》本），有的版本作“條”（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游宦纪闻》所见诸本均作“條”（《知不足斋丛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就版本用字而言，难以断定何字为正，先姑置不论。而就汉文的字义或词义而言，作“條贯主”，在汉文中没有意义；作“條贯主”，勉强可以理解为“条贯之主”，可是无论是在宋代还是在前后哪个朝代，汉文中从来未见将皇帝或国王称为“條贯主”的。那么，由于表文是一种译文，就可以考虑，它们或者是一种音译用字。

“條（條）贯主”这三个字，今拟中古汉语读音，作 t'au (d'ieu) - kwan/kua - t'çiu。以此读音，正可以比对 tabghač / tavghač。这 tavghač 就是当时喀喇汗朝境内讲突厥语的诸民族对于中国的称呼。这一点可以找出充分的文献证据。例如北宋时别失八里（Bishbalik，在今新疆济木萨尔县境内）僧人详古舍利都统将《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从汉文译成回鹘文，即称中国为 tavghač。<sup>[2]</sup> 而最有力的文献证据则是马合木德·喀什噶里（Mahmud Qashgari，又译作“马哈木·喀什噶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 1076—1077 年编成的《突厥语大词典》。

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对 tavghač 的基本解释是：“‘马秦’是该国名称，

[1]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2nd ed., p.273, London, 1958.

[2] 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原载《考古学专刊》丙种第 1 号，1953 年，收于《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 年。